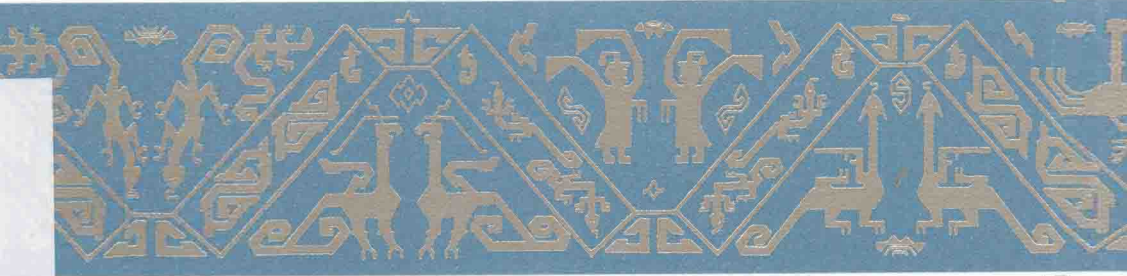


■ 何兹全 主编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走进晚明

商传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何兹全 主编

走进晚明

商传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晚明/商传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0592-7

I. ①走… II. ①商…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晚明 IV. ①K248.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16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走进晚明

商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592-7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frac{1}{2}$

定价: 40.00 元

总 序

何 兹 全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

2 总序

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地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

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自序

如何评价晚明的这一段历史，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们跟随白寿彝师编写《中国通史》（明史卷），白先生在谈到如何写好这一卷的时候，便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若能将晚明时代的政治腐败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繁荣写明白，便是一部好书。我们按照白先生的要求写成了这部通史的“明代卷”，也写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曾经谈到晚明的社会转型，但是似乎并没有写得很明白，我们还有许多困惑不解之事。先师谢国桢刚主教授是以研治晚明史而著称于学界的，但是我跟随先师读书时日尚短，当年兴趣又不在晚明，对于晚明的历史实在是不能甚懂，寿彝师的问题，也只能放在心里，一时不能回答。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晚明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先师祖孟心师《明史讲义》专述《万历之荒怠》：“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①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这是一句为人所熟知的评论。一个亡国的时代，无论如何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的评价的。

^① 孟森：《明史讲义》第2编第5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2 走进晚明

八十多年前，先师著成《晚明史籍考》，他在自序中说：

吾国近古政事之禁，无逾明季。自万历、天启之时，客魏乱政，政权旁弛，于是有流寇之乱、门户之争，外寇莫防，卒至清兵长驱入关，北京不守。^①

先师在序言中还描述晚明之政局说：

当明之季世也，不曰东林，则曰魏党。当时又有楚、浙、昆党之分。《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论党争之祸云：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挺击者、最后争移官红丸者、忤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之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②

这大约可以代表对于晚明历史最传统之认识。其核心之论，亦为明亡于万历、天启之谓也。

但是先师似乎亦非将万历朝事视为一塌糊涂。比如他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就曾经说：“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万历间是东林与三党相争的时期，天启间是魏党专横的时期，崇祯至永历是两党相轧的时期，康熙初年是党争的末路。”^③

我认为，先师此论，其实涉及了对于万历、天启及崇祯三朝政

①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印民国21年8月版，第1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引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治的评价。按照传统观点,这三朝的政治,皆无是处,是有明一代让人不堪回首的时段。万历朝虽有东林的奋争,却不能改变明朝的颓势。

不过这只是先辈学者对于晚明政治研究的结论。近年来,对于晚明历史之研究,已不限于当时的政治,更多学者关注于晚明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对于晚明这段历史的认识也有所变化。

我曾经与师友论及于此,从理论上感到,晚明政治之腐败,乃是旧体制之崩溃,而只有旧日体制之崩溃,才可能有新生事物出现之可能,晚明之经济,乃是商品经济,晚明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之开端,我们经常说到的晚明社会生活,其实亦是商品生产条件下之城镇生活。其后再读到台湾徐泓教授关于晚明奢靡风气的研究,也便更深深感到晚明的历史,反映出—个时代的变迁。

那时候,我们的近代史,指的还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虽然海外学界,包括台湾的学者们,已经将明代的历史纳入近代的历史范畴,我们却仍然守着当年历史分期的底线,而不能有丝毫逾越。

上个世纪 80 年代,傅衣凌先生在厦门大学开了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的课程,几年后出版,即先生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先生是中国较早将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前辈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变化研究,傅先生最早关注到了晚明历史的发展变化,先生曾经说:

我记得龚定庵先生有几句很中肯的话,颇不为人所注意,他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

4 走进晚明

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者，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龚氏的卓见，在于如实地指出明末社会的变化，不是衰世，而是新时代的开端。^①

这是我们最早听到关于晚明时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论述。但是傅先生当时的研究目的是要解开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原因，所以后来傅先生没有再强调他的这一观点，而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早熟”与“不成熟”的性质中去找寻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了。所以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缓慢，并在总结原因时说：“长期以来，死的拖住活的，使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受到这些规律的支配。”^②他说的“活的”，就是变化的社会经济，他说的“死的”，就是不变的专制政体。

90年代，我与曹大为、王和、赵世瑜诸兄友合作编辑的《中国大通史》正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写作大纲中涉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晚明的问题，它究竟是中国近代的开端，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起步。这是两个相近却又不大相同的概念，一个是说它已经属于中国近代历史范畴，另一说是其仍处于近代历史的前夜。不管晚明是中国近代的开端，还是前近代时段，这两个概念也都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1页。

^② 同上，第209页。

虽然在学界始终存在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与变迁论的不同观点，但是近年以来，主张中国传统社会在晚明时代开始发生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转型的观点已渐渐为多数学者所公认。

近年来，晚明史研究逐渐为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除去研究论文之外，也先后有一些专著问世，比如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万明先生主编的《晚明社会转型研究》和张显清先生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等。这些著作，或是对于晚明史进行了深入解析，重点论述了那个时代的城镇化与商品生产的情况，或是将那个时代定义为社会转型时期，使我们对于晚明时代的历史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张显清先生在他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的导论中说：“我们反对中国历史不变论，吸收中国历史发展论的一切有益学术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观点。”^①万明先生将这一转型定义为社会变迁，在她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说：“晚明，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对这一色彩斑斓，时人称为天崩地坼的社会实态进行研究，形成了晚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②赵轶峰教授在谈到晚明的这种变迁时说：“看到明末财政危机的新质因素，就可以看到，16、17世纪中国的变迁，远远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发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断语所能概括的。

^① 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这个社会的国家、经济、社会组织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它是一种整体的结构性震荡。力图在这一过程中追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前景只会使人们忽略这些变化的深刻历史进化意义，并且会最终导致‘停滞’论。进化的内涵，并非只是走向资本主义。”^①樊树志教授提出，以“全球化”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角度大异其趣，或许会给今天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②与前面几位学者不同，樊教授更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且他认为“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外部的良好环境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与珍惜，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③但是樊树志教授还是认为晚明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在叙述了晚明时代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变化后说：“以上简单勾勒了晚明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融入世界的过程，以及在中国内部所引发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④

尽管几位学者对于晚明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看法并不尽同，但是他们同样都认为晚明时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启了

① 赵轶峰：《明代的变迁·导言》，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页。

② 樊树志：《晚明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03页。

一段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代。这与前辈们对于晚明时代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他们较前辈学者对于晚明有了更全方位的认识，因此，我们感到，我们的前辈们与我们过去可能都曾经误读了这段历史。

对于晚明历史研究的进展，使我们对于晚明时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改变将晚明看作一无是处的同时，我们对晚明时代的历史评价发生了变化，如果晚明时代是一个中国自身近代化的起点，它的历史地位当然也不能低估。无论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奢靡，官场的乱相，民变的发生，乃至矿税的征收，都迥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对于晚明的评价，由低而高，由贬而褒。

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晚明时代人们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变化，看到经济发展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看到新的思想与文化的产生。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受到了晚明时代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生事物的发生与发展。原来晚明并不像我们以往认识的那样，是一个行将灭亡的时代，而是在旧体制的衰败中不断产生新生事物的社会转型期。

带着这个问题，我对晚明的政治生活情况进行了研究，写了《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一文，我认为，在晚明时代，不仅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了繁荣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特点，在政治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专制政体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冲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对于晚明这种变化的认识却碰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朝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好形势下，却逐

8 走进晚明

步走向了灭亡,并且几乎无人有回天之力呢?我们过去传统地将此归结为晚明的党争,党争误国,或者说党争亡国,是许多学术著作中经常看到的观点。但是倘若研究一下晚明的党争,就会发现,在官员士大夫们结党相争的时候,他们结成的党,虽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却已从旧日单纯的朋党进步而成为了党社。问题在于这种政治的进步,丝毫没有改变晚明政治的颓败,甚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国家政权的反作用。其实,党争的价值在于它与专制皇权的对立,是对于传统皇权专制的破坏,所以到了清朝,为巩固皇权专制的政体,就必然对朝廷中官员们结党相争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

明朝是否会因党争而亡,因为尚未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无从知之。但是明朝毕竟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这已是不争的史实。所以以往传统的历史观,强调了晚明时代的阶级斗争,而且以往我们在谈到晚明阶级斗争的时候,将北方的农民起义与江南城市民变作为阶级斗争的两个突出表现形式。其实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农民起义以摆脱国家政权控制以及推翻官府和朝廷为目的,城市民变,则是以群体行动的方法要求国家改变现行政策,是新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一般来说,农民起义的成分是以农民或者地方社会底层为主体;城镇民变的参加与支持者则成分复杂,不仅以城镇手工业者、小商贩为主体,也包括了富商、士人甚至地方官员,而这些人基本不会去参与或者支持农民起义。

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在他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中,借用西方社会学者的理论,将晚明民变定位为“城市群众集体行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群体事件”

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期,新的利益诉求下的一种难免发生的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并不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①

近年来学界对于晚明的研究,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新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正因为有这种新的认识,也使我们改变了对晚明的评价。我们将过去对晚明的批评看作是一种误读,由于晚明时代有许多代表社会发展进步的现象,于是我们也渐将晚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难能可贵的时代。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那便是这个时代的种种进步,却未能挽救明朝的社会危机,明朝最终毕竟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被农民起义推翻,并最终为崛起于关外的清朝所取代。

我们尝试着解释这一问题时,感到晚明时代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在传统专制政体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城镇民众的群体事件频发,正是这种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晚明国家政治的更突出的特点,则是国家权力的异化。本应作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之间调节角色的国家公权力,成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而与全社会民众,主要是代表新生事物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激化,这才是晚明时代新的社会特征。

晚明虽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它依然没有能够逃脱历史周期的命运,这也正是我们过去对于晚明认识的基点。

从理论上讲,旧体制与社会变迁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应该是

^① 参见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却无法证明明朝灭亡的后果是因为社会变迁造成的,从表象上看,明朝灭亡的过程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的灭亡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

虽然结局相同,但是晚明与历朝历代毕竟有不同之处,明朝是在江南地区与北京等地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繁荣中灭亡的,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打击下,又经历了清军入关的第二次打击而灭亡的,所以更给时人一种“天崩地坼”的感觉。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晚明与历朝有所不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将其归纳为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显然晚明时代国家权力没有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并因此产生了更多且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将其总结为国家权力异化。

从万历到崇祯的一百年时间里,明朝政府始终未能改变其国家角色异化的问题,待到明朝灭亡的前夕,此种异化的程度有增无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减。奇怪的是,明代国家权力异化的过程,恰恰与社会转型的变化相始终。我在《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一文中,谈到两个异化标志:一个是权力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一个是国家利用权力攫取不当得利,即对赋税的肆意征收,这也是在晚明史上人人皆知的矿监税使的事件。

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已经风卷江北各地,朝廷军费不足,有奸人李璉议征江南富民,以充军需。内阁大学士钱士升怵然曰:“此乱本也。”拟刑部提问。崇祯帝不愠,命改票。公具揭痛驳之,谓:“巨室乃国家元气,故《周礼》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晋、楚、豫无一宁宇,惟江南数郡未动耳。若此法行,驱天下为盗贼矣。”言要直,忤上意,而温体仁复奉迎,以为可行。公复上宽简虚平四箴,上愈不悛,遂请告归。^①士升所言,自然为崇祯帝所不满,然而江南数郡不动之根本原因,在于当地虽然发生过城市聚众的群体事件,却未发生农民与政府的激烈对立,而城镇民众的群体事件,目标只是为政府调整其旧政策,并不以推翻国家政权为其终极目标。

此则记述中反映出明末的国家形势十分明确,大江南北,已迥然不同,此时的北方已无宁宇,而江南未受北方动乱的影响,相对稳定。北方无宁宇,是为明末农民起义遍布北方各地,江南未动者,指其平静而无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动乱。其实江南乃晚明民变多发之地,从万历至崇祯,民变不断,且从反抗矿监税使发展而至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阉党,再到民抄董宦之仇富式的社会化激

^① 参见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二《臣谏》,《元明史料笔记丛书》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